

一个当代人眼中的故宫衰荣

本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江晓雅

日前，由80后自由写作者安意如撰文、著名摄影家李少白摄影插图的《再见故宫》在京首发。此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和中国国家地理图书公司联合出版发行。

会上，安意如身着白粉相间的冬装旗袍，颇显古典气质。记者了解到，她以前写过《人生若只如初见》等解读古典诗词的书籍。《再见故宫》是她的首部图文书，也是她第一次涉及关于明清历史的宏大题材。书中所述内容涵盖历史、文化、建筑等多个领域中。

安意如解读了书名中的“再见”：“故宫已是历史陈迹，那里的昨天已经和我们再见。到那里只能寻觅古人的气息，和历史告别。对于我们，可能小时候就埋下了‘去故宫’的愿望。当我们站在故宫

中央，我们是否能理解——这个地方的悲喜，这些人的悲喜。而这些又是怎样深刻地影响了历史？”

安意如说，她努力使此书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它的创作很考验历史驾驭能力和信息分析能力。为了写它，我读了很多相关历史书籍。为了保证信息正确，书稿写完后，还送去给故宫的清史专家审定。”

她也谈到她对穿越剧与穿越小说的看法：“当然可以接受，它们是丰富娱乐生活的形式。穿越可以，但别一本正经地‘穿’错了。得对历史有最基本的尊重，在知道历史的基础上再去‘意淫’。而事实上，真正的历史要比‘意淫’出来的，精彩一万倍。”

安意如说，希望用这本书，把历史中真实的细节展示给大家，比如宫女们不喜欢故宫的工作环境时，不能像现代职场女性一样吐槽；比如清代的皇子们，常常天

不亮就要起身，在很不舒服的座椅上开始一天的读书生活。她说：“这本书，用文字、用镜头，倾诉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安意如在书的“跋”中写道：“再见，故宫！这世上有什么值得过时间？所有的荣耀，辉煌，屈辱，悲凉，都融入沧桑。有多少欲说还休事，尽付与无常。”

当下，各类读物、众多的影视及美术作品不断演绎着故宫，故宫的形象似乎早已丰满。今年3月，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推出《大故宫》一书，并提出“大故宫”的概念，首次打开了传统故宫的外延，把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山五园、避暑山庄等纳入了故宫姻系，讲述了明清二十四位皇帝和一位“女皇”慈禧在紫禁城治居的历史。书中除有历史学的知识外，还涉及建筑学、文物学、文献学、档案学、艺术学、园林学、规划学、故宫学和满学等内容。

与阎崇年的学术气不同，《再见故宫》一书带着作者的性情和视角，力图用文字和影像全景式解读紫禁城风云，寄托对这座世界上最大最宏伟的宫殿群的怀想，倾诉对历史的反省和追思。全书分为“奈何”、“涟漪”、“遗恨”、“秉政”、“哀荣”、“盛衰”、“凄怨”、“悲凉”八辑。安意如以故宫为背景，结合自己独特的视角，将明清两代的历史变幻娓娓道来。改朝换代，谋朝篡位，前庭后宫，恩怨纷争……变幻的是一轮接着一轮的历史，亘古不变的是紫禁城本身。一座紫禁城，诉尽了历史的往复和人世的悲喜。“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有人人说故宫是很多人儿时的情结，是他们一生必去的地方。对于这本书，有的人看的是故事，有的人透过故事看自己。任何有着故宫情结的读者，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收获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插图的摄影者李少白介绍，《再见故宫》里的图片是他摄影创作转型后的作品。他说：“上世纪80年代时，我喜欢摄影美女。但有一位摄影家批判只能搞美女摄影。我就想拿摄影作品让他闭嘴。我在想，什么最有文化内涵呢？故宫！所幸我家离故宫近，当时门票又便宜，我就开始故宫摄影了。”李少白曾著有《看不见的故宫》中英文双语画册，其长城和故宫摄影作品分别在德国、日本、爱沙尼亚、瑞士、美国等国展出。他说：“我觉得中国最美的‘美女’，第一是长城，第二是故宫。”

安意如说，她最喜欢故宫风景中的雪景：“故宫太繁华，金碧辉煌，雪景中，才有‘留白’。”

李少白介绍，此书在撰写文字和选择摄影插图过程中，都在避免和已有作品风格重复。“比如以前关于故宫的书籍，多是学术研究性的或旅游介绍性的，但这本书的文字内容不一样。”安意如也说：“选择图片时，也不要‘明信片’式的故宫，而要‘不一样’的故宫。”书中李少白的摄影图片具有暗示性与表现性。比如一张呈现红漆宫门反射中的宫殿影像的图片，表现出历史的残酷感与苍茫感。表现宫壁与壁间黄色小花图片，就有点与块，娇嫩与粗犷的对比，引人遐思。

《乌合之众》对民族教育的反思

聂根鹏

《乌合之众》，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著，一本当之无愧的心理学经典名著。

我以為，在群体麻木、组织松散的时代背景下，这本书所包涵的思想足以拨动每个个体凌乱的神经。进一步来说，透过它，我们能感受到时代变革背后跳动的脉搏，解读出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暗藏的秘密。

《乌合之众》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分析了大众群体由野蛮走向文明、由文明走向灭亡的原动力，这种动力贯穿并支配了文明循环的生命历程。在人类文明循环往复的这条主线里，当前的时代就是其中一个节点。在这个特定的节点上，这种动力对我们民族的教育毫无疑问具有深刻的反思价值。

书中有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是由于长时间酝酿的观念的引导。当一个群体由分散的个体形成一个有共同特征的整体以后，他们便有了共同的习俗和相似的行为方式，并由此形成了共同遵循的制度。然而，由于群体大众的易变、盲目等特性，伴随着新观念对旧观念的取代，大众必定要打破旧传统对自己行为方式的束缚，进而建立符合新观念的制度。

由此得出，观念引领着人类文明不断向前演进，而抛弃旧观念去接受新观念之间的博弈便是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博弈之后建立新的制度相对于旧制度的进步程度取决于人们心中的新观念和新观念在人们心中扎根的深度。而在观念的进步过程中，教育无疑是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教育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它的作用应该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传承已有的先进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先进思想观念之间的碰撞，进而孕育出更加先进的观念。一般而言，一种传统观念的消亡和另一种先进观念的正式形成需要在时间的催化下经过漫长的等待，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之间的传承接力，就像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教育正是这根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且看“一位记者笔下的小题大做”

潘琦

《一位记者笔下的小题大做》是一本很有特点、很有价值的书。

这本60万字的书籍比较完整地收集了罗昌爱40年来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的很有分量的文章，并附有权威性的深度点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透过这些生动、真实、贴切、质朴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罗昌爱昂扬的革命热情、深邃的思想、睿智的眼光和独到的视角。

当今，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各种思想与文化汇集，其交流、交锋、交融亦更加频繁。同时，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凸现。许多人藏着想说的话和发表的意见，都因匆忙而没有时间说，并且不知从何说起。一些看似小事的鸡毛蒜皮，如果忽略不及时处理，都有可能发生“螳螂之穴毁大坝”的惨剧。在这种背景下，罗昌爱几十年如一日，怀着对党的事业忠诚、对人民群众极端负责的态度，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特有的锐利眼光，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到事物本质，然后著之笔下“小题大做”，启迪思想，教育民众，引导舆论，沟通民心，达到事半功倍和滴水见日的效果。

据我所知，罗昌爱并非科班出身的新闻记者。他于上世纪70年代初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公社广播站踏入新闻工作的门槛，后成为广西日报新闻报道通讯员，当上“土记者”。我和罗昌爱爱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在和他多年的交往中，看到了他身上令我钦佩和敬重的素质——他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有着追求真理的勇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昌爱同志的人生追求。他有着很强的新闻敏感，能够迅速、准确地发现新闻线索，识别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这既来源于他对人们内心灵魂的认识与关注，也来源于他对社会生活的科学观察和经验积累，更来源于对党和政府决策的了解明晰。他没有经过正规的系统教育，便深知自己先天不足，因此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大胆实践，闯出了一条自学成才之路。

冷静地关注社会，客观地记录事实，真实地反映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事件，是罗昌爱40年从事新闻工作“小题大做”的事业。我以為，世界上，一个人对事业的执着与兴趣都会使之变得勇敢和无畏，并且一往无前地踏着困难向前走，迎着风浪向前行。

小蒋视线

一棵菜精神：人艺的镇宅之宝

——访《谁在舞台中央》作者方子春

本报记者 蒋肖斌

“一棵菜精神”——方子春多次提到这个由焦菊隐提出的人艺宗旨：“北京人艺是一棵菜，有菜心、菜叶、菜帮，每个人都在起着自己的作用。也许不是他人站在舞台中央，而是他做的一个东西。可这个东西就代表了他的精神和才华。”

张大爷是谁？即使再铁杆的粉丝，滤一遍脑海中的北京人艺美术剧院导演和演员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他。不过，他的确是一个人物，而且是位于北京史家胡同56号人艺宿舍大院里的一个“镇宅之宝”。

张大爷是宿舍传达室的看门人，收发报纸和信件、拿牛奶、防火防盗、闲杂人等进出宿舍这类大事小事，统统归他管，“权力大了去了”。他高大的身材和并不英俊的面孔，常带着紧张又兴奋表情的孩子们的游戏。方子春在新书《谁在舞台中央：人艺那些角儿那些事儿》中这样写道：“‘老张，老张，老张的媳妇会打枪；枪对枪，杆对杆，不多不少十六点儿。’这是早年北京人艺宿舍大院孩子们必唱的儿歌”。

这首儿歌方子春小时候也唱。从小在人艺宿舍大院长大的她，像焦菊隐、欧阳山尊这样的名导，朱琳、蓝天野这样的明星，就是身边生活着的叔叔阿姨。一样柴米油盐，一样的家长里短。

人艺大院里更多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也在方子春笔下第一次被掀开大幕，登台亮相。“我想让人们真正看到，不光是导演、演员，而是周围捧戏的‘大多数’。他们也在舞台中央。”方子春说。

1941年秋天的一个寒冷早晨，贵阳城里掌管着三大药铺的少爷宋垠，离家投奔抗战戏剧队。阴差阳错，成为一名灯光师。上世纪50年代初，人艺捉襟见肘时灯具也不够用，他没办法，只能自己做。有时连



话剧《蔡文姬》剧照

街头“洋铁壶”手艺人的灯都得用上。如今已近90岁高龄的宋垠有些健忘。可是每到下午5点钟，他都会着急吃饭，因为这几十年以来只要有演出，他一定会在6点前，赶到后台管理灯光。

丁里在他风华正茂的年纪奔赴解放区，成为一名出色的道具师。他曾经“妙手偶得”，在演员金雅琴的大腿上画出了“丝袜”，也曾用白布和纸馅做出饺子。“不光要做得像，还要省钱，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最好的东西”。

还有舞美师王文冲、音效师冯钦、首都剧场经理杨青，甚至普通的装置工人，都在方子春书中留下了印记。

书中讲了这样的故事：装置组的杜广沛主管拉大幕。他拉大幕的功夫曾经在上个世纪60年代震惊了上海滩。为什么这样说？当时，郭沫若创作、焦菊隐导演、朱琳主演的话剧《蔡文姬》在上海演出。朱琳回忆说：“一幕结束时，蔡文姬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这需要舞台各个艺术门类多方面配合。杜广沛做得非常好。我从台深处往前走，大

幕缓缓跟上，到最后‘哗’的一声闭上。在这之前没人这样做过，上海震惊啊！”

“一棵菜精神”，方子春多次提到这个由焦菊隐提出的人艺宗旨：“北京人艺是一棵菜，有菜心、菜叶、菜帮，每个人都在起着自己的作用，兢兢业业工作着。也许他只是做了一把椅子、搬了旁边的一块石头，也许不是他人站在舞台中央，而是他做的一个东西，可这个东西就代表了他的精神和才华”。

方子春并不是人艺的演员，只是从小生活在人艺宿舍，又幸运地跟着诸位叔叔阿姨学了一些表演基本功，于是能在几十年后走进他们家中——访谈。

缓缓跟上，到最后“哗”的一声闭上。在这之前没人这样做过，上海震惊啊！”

“一棵菜精神”，方子春多次提到这个由焦菊隐提出的人艺宗旨：“北京人艺是一棵菜，有菜心、菜叶、菜帮，每个人都在起着自己的作用，兢兢业业工作着。也许他只是做了一把椅子、搬了旁边的一块石头，也许不是他人站在舞台中央，而是他做的一个东西，可这个东西就代表了他的精神和才华”。

方子春并不是人艺的演员，只是从小生活在人艺宿舍，又幸运地跟着诸位叔叔阿姨学了一些表演基本功，于是能在几十年后走进他们家中——访谈。

“布老虎中篇书系”引人瞩目

本报讯(实习生刘瑜)日前,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布老虎中篇书系”出版面世。该“中篇书系”收录了近年来引起社会关注的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中篇小说作品。其中包括刘庆邦的《大声呼吸》、刘庆邦的《我们的村庄》、邱华栋的《塑料男》、邵丽的《寂寞的汤丹》、徐虹的《青春晚期》、钟求是的《两个人的电影》等。该“中篇书系”主编、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认为,在目前消费主义语境下,中短篇是弱势的文学样式,文体与市场无关。这套丛书集中了当代优秀中短篇作家的作品,被多传播一次,被阅读的可能性就越大,作家被读者知道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春风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韩忠良说,倡导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民国“先生”如何处世立身

——评《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

唐书钰

□如今大师踪影难寻。满目都是师德堕落，师生交恶的新闻

□越是乱世，越懂得利用学术之力造就人才

□它不简单是指教授人学识的老师，更是指那些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

近两年对于民国元素的追捧开始兴起，各种研究文献层出不穷。我以為《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的出版汇集了很多民国大师的文章，内容更为真实。较之后人编纂的学术研究而言，内容也更为详实。如同烹饪美食，如果说今人的追忆是直接端上桌的精美菜肴，《民国大学》中收录的大师作品则像是陈列在案板上的新鲜食材，能够料理出怎样的美味全凭读者自己的建树了。

本书的作者之一谢泳一直致力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他的文章，特别是针对西南联大的研究也收录在书中。谢泳在文章中提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虽然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英。吴晗的名篇《谈骨气》中开篇便是一句“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骨气反映在读书人身上，就是那股为了学术赴汤蹈火的勇气。诚然，无论是对于纯学术的追求还是受西学的影响，在民国时代尽管政治动乱、内忧外患，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尽可能地希望能够创造出学术的盛世之境，不夹杂政治或者经济因素而单纯地存在。

中国有个其他语言很难诠释的词——先生。表面上看，那不过是一种对于老师的旧式谦称，而事实远不止如此。先生是什么？它不简单是指教授人学识的老师，更是指那些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的人。他

们用自己坚硬的脊梁和牢不可摧的信念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学术的厚土。想来如今的世道纵然常有锦衣玉食、纸醉金迷，却始终摆脱不掉浮躁和消极。这不单是因为更多的物质选择迷茫了人们脚下的道路，更因为在许多人心失掉了那架衡量世事的天平，也失掉了那些坚不可摧的信仰。

民国的先生们除了对大师式的教育极力推崇，对于高校建立具有独立性的学术氛围也颇为用心。冯友兰指出，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应该是一个“尚贤”的地方。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说时首先提到的便是清华的经济问题。他并不认为一定要投资大量超过清华负荷的设备才会使之建成名校。“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优秀的大师远胜于一座冰冷的建筑。据载，有着“中国私立大学之父”之誉的张伯苓，更是为了南开大学的学术独立性，与民国政府“约法三章”，使其最终可以回归私立性质。

《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中收录的民国先生的演说和文章，虽然有些如今看来略显晦涩，但灌注其中的民国教育的理念，是当今人们思考文化教育的标尺。民国时代的大师所承载的更多是纯粹的学识。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不相信会有年轻的心是不谙世事的。但显然，当时的人更懂得如何去选择自己的道路。越是乱世，越懂得要利用学术之力造就人才。

陈丹青曾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省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是周树人。如今大师踪影难寻，师生交恶的新闻时有耳闻，让人感叹不已！当下的教育者应当借鉴的，正是民国时期学者挺直的脊梁和教育育人的坚定信念——教授后辈读书人摒弃虚妄、安心治学。也只有这样，才真正当得起先生——这个简单却沉重的头衔。

书山有径

通往乌托邦的道路是苦旅

杜卫东

在《一样的月光》开篇伊始，作者单振国就用一段极其精炼的文字总结了中外文学艺术大家关于小说语言重要性的经典论述，强调“文学应该成为语言的乌托邦”、“释放”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从而发出“强化汉语语言文学能量，捍卫小说尊严”的呼吁。

这段话，可以解读为作者的夫子自道，可以解读为作者的文学理想，可以解读为作者孜孜以求的方向，因此，自然也就成为我们通往其文学世界的一条林中路。沿着这条幽微的小径前行，我们时时为作者创造的语言乌托邦——为其意境的朦胧诗意，为其叙述的自然生动，为其语言的素朴感伤——所吸引，所感染，所打动。比如，在《一样的月光》中，作者就用月光一样的语言，建构了一个月光一样神秘的湖边世界，塑造了一位月亮一样美丽的青春少女，讲述了一个月亮一样忧伤的爱情故事，呈现了一颗月亮一样纯净的年轻心灵……令人不得不停顿，沉思，品味。就像穿行在春天的原野中，不时驻足观望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于语言的锤炼并不是“为语言而语言”，而是注意与小说的整体氛围、情感的自然流露特别是与人物心理的呈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小说语言具有了深层次的内涵和美感。在《遗志》中即是如此。如，当主人公许二瓜离开了生活50多年的家园，就要踏上城市流浪与打拼的漫漫长路时，作者这样描述主人公的感觉：“他走出村口那一刻，忽然感到像掉了魂

似的，浑身都孤零零地立不住……”这样的描摹是多么传神！对于一位在乡村生活了50年的老人来说，对于一位对城市一无所知的庄稼汉来说，离开家园不就是离开自己魂魄得以滋养的精神归属吗？离开这里，不就是丢失了自己的魂魄吗？丢失了魂魄，再强大的肉体也将失去应有的重量。再如，许二瓜在城市中的一座破窑里安身之后，跟隔壁青年刘顺产生了“相依为命”的感觉。在春节来临前的一个大雪之夜，老人是这么孤独，这么想念离“家”已久的刘顺：“闲着无事的许二瓜是多么多么盼望刘顺能够回来啊！他现在真想和刘顺烤着这呼噜噜烧旺的火炉，抿着烧酒，东一句西一句地拉闲话。这样的时光应该是让他最感到惬意和温暖的，那才叫家的感觉、亲情的感觉，那股暖意才会熨帖到他苍老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呀！才让他感到活着是多么多么的好啊！”

我们的感动不仅来源于作者呈现出老人深刻的孤独感，更来源于老人和刘顺这两个“底层”生命间的互相依靠、互相温暖——正是这种信念、这种依靠、这种温暖，让他们相濡以沫，共御寒冷——既有自然界的寒冷，也有社会上的寒冷。伴随着老人日益深沉的想念，我们也不禁想念起在寒风中“挣扎”的刘顺来——即使我们已经隐隐地猜到，就像老人所隐隐地感觉到的一样，刘顺是一个偷盗者。

沿着这条幽微的林中路，我们走到了作者营造的艺术世界深处。实际上，作者之所以强调小说语言的重要性，强调文学是语言的乌托邦，是因为他知道，在语言的乌托邦背后，或者

一直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宗旨和追求。据悉，“布老虎中篇书系”是春风文艺出版社近年来竭力打造的经典品牌。在过去的几年中，曾出版过葛水平、胡学文、徐则臣、金仁顺、孙惠芬、陈应松等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中篇小说作品。该“中篇书系”责任编辑张玉虹说，虽然现在出版文学作品在经济上要冒风险，但是作为一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在考虑市场的同时也需要坚持文学操守、追求社会效应，出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家庭与事业的痛苦，但对生活依然是感恩的。“焦菊隐先生告诉过我，机会是均等的。只有你负机会，没有机会负你。”

什么是艺术家？方子春突然反问我一个严肃的问题。“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人。”我答。“不。艺术家的定义应该是：钱比大腕儿拿得多，戏要比人演得好，能够起得早睡得晚，给别人垫场，完了还什么都不说，态度还好……”

提起该书书名，方子春说：“谁谁都想在舞台中央。但是，在舞台中央的永远是艺术之魂。”

很多人曾怀着朝圣的心情去寻找北京史家胡同56号院，却发现那里早已“物非人非”。

人艺没有忘记张大爷。人艺每逢周年大庆，都会出版一本《北京人艺艺术剧院建院纪念册》。其中，张大爷的名字和导演、演员一起，端正地记录在案——张大爷大名，张明振。

我们发现了他的绝大多数小说承担着同一个共同的文学母题——救赎：《一样的月光》是对纯美爱情的救赎，《遗志》是对人间温情的救赎，《鸽子找妈妈》是对家庭的救赎，《缴钱不杀》是对纯净心灵的救赎，《看看儿子的事业》、《潇洒走一回》是对淳朴世风的救赎，《红日熔金的秋天》是对高贵精神的救赎，《母亲的手铐》是对母子之爱和责任救赎……即使只有千余字的微型小说《最后的面试》，也充盈着救赎的主题——对礼教的救赎，对操守的救赎。通过杜嘉喜的评论我知道，单振国本就是一位有道德担当的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位有精神追求的人，一位有文学理想的人。简言之，他是一位有着美好心灵的作家。

我与单振国只是一面之缘，但就是这一面之缘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热情、爽直、正气、有责任心；他的文学趣味纯正，他的文学理想纯粹；他的文学追求执着。

客观地说，不仅对于单振国而是对大多数作家来说，这条通往乌托邦的道路都是一条漫长的甚至没有尽头的苦旅。要想在这条漫长的苦旅中有所作为、有所收获，需要作家在艺术上、精神上，甚至在生活中，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单振国已经满怀坚毅地踏上了这条长路。